

文化名人坊

遥望那座戏剧的丰碑



1953年,许麟庐(左)与齐白石(中)、李苦禅(右)合影。

因为有了他的创作,中国戏剧才有了真正与世界最优秀的现代戏剧对话的空间,也因为有了他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等作品横空出世,中国话剧舞台才有了如此精彩的表演,一代又一代观众可以享受话剧艺术的美感。

曹禺先生的艺术创造力和社会影响力穿越了时光岁月,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,直至今日都让人难以忘怀。1996年12月13日,曹禺先生在北京逝世,享年86岁。

一生关注思考人的问题,话剧创作来自生命体验

如何概括曹禺先生的戏剧艺术特色呢?曹禺先生在晚年访谈中,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,谈及自己十七八岁时的思想状况,认为自己考虑最多的是“人活着是为为什么”。这一玄思冥想,将他的创作注意力引向了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。

在文学史上,并不是所有创作者都对人的问题感兴趣。有的作家对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感兴趣,而有的则对风土人情、地方文化感兴趣,但曹禺先生明确而坚定地认为自己对人的问题最感兴趣。这种兴趣首先来自他童年家庭生活的影响。



青年曹禺。

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,回国后曾一度担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,但他对军旅生活没有兴趣,很早就退守到天津做富公了。在曹禺的印象中,父亲“胆子很小,没有打过仗。他念书很多,倒是个地道的人,是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。四十几岁时就经常找几个文人,在一起吃吃喝喝,或赋诗,或写对联,或抽大烟,或发牢骚,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”。

曹禺的父亲先后娶过三任妻子,曹禺是第二任妻子所生,可惜的是曹禺生下来第三天,母亲就得了产褥热病逝了,他是第三任太太——他母亲的妹妹带大的。曹禺对家庭的印象,是简单,但“十分别扭,我不喜欢我家。”“家中的空气非常不和谐。从早到晚,父亲和继母在一起抽鸦片烟。我记事的时候,父亲就不做事了。上中学时,我每天早晨去上学,下午4点回家,这时父亲继母还在睡觉。抽一夜鸦片,天亮才睡觉,下午四五点钟才起来。我回家后,家里鸦雀无声。其实家里不少人,厨子,一个帮厨的一个,拉洋车的一个,还有一个佣人,一个保姆。但是沉静得像坟地墓似的,十分可怕。”“这就是这么一个沉闷的家庭,躲到自己的房子里去读书。”

曹禺小时候似乎不是特别开朗,他父亲老是笑他为什么总皱着眉头。曹禺的大哥也抽鸦片,父亲无奈之下跪在曹禺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。这一幕给曹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。所以,这些环境和情节,在曹禺的话剧创作中似乎都有所体现。像《雷雨》中周朴园的家长式的威严、不讲情面,像繁漪在周朴园、周萍面前,强忍屈辱,饮恨喝下汤药,这些都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场面,某种程度上,是曹禺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周围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。曹禺在《北京人》创作谈中,甚至很明确地说:“《北京人》中的曾皓这个人,就有我父亲的影子”。

年轻的曹禺何以能连续写出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

曹禺1910年9月生于天津。1933年暑期,大学四年级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《雷雨》初稿,此时他24岁。1934年7月1日,郑振铎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第3期刊发了曹禺的处女作《雷雨》。同年8月,日本学者武田泰淳、竹内好将《文学季刊》带回日本,推荐给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杜宣等,留学生们开始热烈讨论《雷雨》。12月,浙江的春晖中学演出《雷雨》的片段。《雷雨》真正大获成功是第二年,唐槐秋经营的中国旅行剧团获得了曹禺《雷雨》的上海版权后,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巡演,《雷雨》轰动一时。此后《雷雨》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。

1936年,27岁的曹禺完成了另一部代表作《日出》,从那年6月开始连载在巴金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上,9月全文发表。距《雷雨》仅相隔三年,曹禺又奉献出了一部话剧力作。1937年4月,靳以、巴金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第2期开始连载曹禺的新作《原野》,至第1期第5卷发表。因抗战爆发,受战争影响,曹禺随国立戏剧学校辗转来到四川重庆以及江安等地。1940年3月31日,重庆《国民公报》·星期增刊编发了曹禺《原野》的剧本,至6月3日连载完。1940年秋,31岁的曹禺在江安开始创作《北京人》。《北京

人》1941年5月开始连载于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“文艺”“学生界”,11月1日连载完。1942年夏,33岁的曹禺花费了三个月时间,在重庆唐家沱的一艘火轮上,完成根据巴金小说《家》改编的话剧作品。

一般话剧史上,都将曹禺的这几部话剧作品视为曹禺的代表作。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情况看,是曹禺23岁至34岁之间完成的。一个剧作家在青春时期,一口气创作出了多部高质量的优秀作品,这样的创造力的持续迸发,实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奇观。

当然,奇观不奇。如果追踪曹禺的成长历程和创作历程,是不难发现在他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,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所难以获得的。除了他早年的家庭生活影响外,他的教育经历也很独特。他所在的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以及清华大学,都是当时中国话剧运动的核心地带。在南开,他不仅遇见了像张彭春这样从美国留学回来,对现代戏剧真正了解、掌握的行家,而且让少年曹禺有机会随老师学习、创作话剧,登台排戏演出,全方位体验和见识现代戏剧的多方面格式和审美训练;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,大量阅读外国戏剧,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和易卜生戏剧。

进入清华大学后,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是耶鲁大学戏剧专业的毕业生,每年都定期为清华购入大量原版外国戏剧资料,让他的学生们有机会阅读和了解国外戏剧的信息。而且清华学生戏剧社团前有李健吾等活跃分子的积极推进,后有像曹禺、张骏祥等积极分子的不断加入,戏剧创作和演艺氛围非常浓,曹禺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加速成长。

另外就是曹禺与巴金等文友的深厚友谊。从20世纪30年代《文学季刊》发表《雷雨》开始,曹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巴金主办的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;而且,巴金每当遇到曹禺,总是给予其创作上的肯定和鼓励,这种文学同仁之间的帮助、提携和激励,大大激发了曹禺的创作热情。再加上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,让曹禺对社会、人生有更多的体验和思考,他的思想在成熟,他的话剧创作的风格也在慢慢变化,由初期的传奇剧、命运剧,在抗战期间转向带有契诃夫风格的日常生活剧。这种戏剧风格的变化,与其个人经历和看待社会人生的态度的变化,几乎是吻合的。

曹禺与上海之关系

曹禺与上海的关系可谓密切,主要表现在作品在上海出版、上演;与上海文友的互动以及抗战后在上海的短暂生活。



曹禺(左)在一九七九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《雷雨》剧组讨论剧本。

曹禺作品单行本出版几乎都在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。曹禺完成一部剧,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一本。这种创作、出版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,体现出巴金对曹禺创作的信任和支持,对曹禺而言,也是一种无声的激励。如《雷雨》单行本的出版,按照体例,有一个序言之类的文本,这其实是要求创作者自己梳理既有的创作思路。曹禺在《雷雨》跋中,用了近七千字的篇幅,整理了自己的创作思路,并且针对当时对《雷雨》的评论,集中就一位作家接受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个人独创的问题,做了回答。这一答复,在理论上将中国现代戏剧的探索,从社会问题剧推向了诗剧范畴的思考。

曹禺在上海有很多朋友,导演黄佐临就是相处终生的挚友。1929年南开新剧团为庆祝25周年校庆,将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作改译为《争强》,曹禺参加了演出。曹禺的演出非常成功,刚刚从英国伯明翰留学回国的黄佐临观看后,写了《南开公演〈争强〉与原著之比较》发表在天津的《大公报》上。这是黄佐临发表的第一篇剧评。黄佐临晚年接受采访时说:曹禺“演《争强》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,眼睛发亮,在场上很活跃。”1940年黄佐临离开江安,经过天津,到上海寻求事业发展,手里拿的是曹禺写给李健吾的推荐信。1941年9月,黄佐临、吴仞之、石挥、张伐等脱离上海剧艺社,另组织了上海职业剧团。10月黄佐临担任导演,在卡尔登首演了曹禺的新作《蜕变》。以后黄佐临还执导过曹禺的《家》以及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1947年,从美国回来的曹禺,一度寄居在黄佐临家里。

上海戏剧舞台演出曹禺的话剧作品,从20世纪30年代上演《雷雨》开始,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,从未间断过。通过上海戏剧舞台上曹禺话剧作品这一历史线索,可以见证近百年来上海话剧演艺历史的巨大变迁,同时也可以看到曹禺话剧作品在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人手里,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2024年,上海戏剧学院上演了曹禺的话剧《雷雨》,它不仅考验了剧作本身在今天演出市场的影响力,同时也体现了艺术院校如何通过《雷雨》的舞台演出,来检验平时对青年戏剧人才在表演、导演训练上的教学效果。

曹禺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,于1946年3月5日同老舍先生一起,经上海坐牢三年的史东山赴美讲学。1947年1月,回到上海,暂住在黄佐临先生家。当时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校长的熊佛西先生亲自登门拜访,聘请曹禺担任教授,曹禺接受了熊校长的聘书。因为经济困难,曹禺这一时期接受黄佐临先生的推荐,到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,他为文华影业公司创作了电影《艳阳天》,这部被熊佛西先生称为曹禺“电影处女作”的单行本,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8年5月出版。

曹禺先生作为社会名流,在上海期间的社会活动十分繁忙。如1947年3月参加了田汉先生五十寿辰聚会。8月应救济总署之邀,与张骏祥等赴黄泛区视察。1948年4月国际剧协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,5月余上沅、熊佛西、曹禺等31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,6月国际剧协准备在捷克举行代表大会,中国推选余上沅、曹禺和张骏祥为代表出席(后因经费问题,只派了余上沅先生出席)。1949年2月8日,受中共地下党安排,曹禺离开上海赴香港,经香港停留后,于2月28日,与叶圣陶、柳亚子、赵超构等坐船北上,通过解放区,于3月18日回到北京。

杨扬

取诸怀抱 写意人生

——许麟庐和他的和平画店

七十多年前,北京曾有一家和平画店,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影响举足轻重;书画界有口皆碑的人中,和平画店的店主许麟庐也是一位。他重侠义、好交友,性格豪爽、大气慷慨。89岁时,曾书写一幅大字,自述生平:“生于蓬莱,长于津沽。游于京华,年将九十。庸庸碌碌,以诚待人。不善辞令,感情用事。涂抹一生,殊不惊人。亲友厚爱,以慰余生。”

变卖机器,创办和平画店

许麟庐(1916年—2011年),出生于山东蓬莱大宅许家村一个渔民家庭,自幼酷爱习书画。4岁时,随长辈逃难至天津大沽口。父亲许树亭经过多年打拼,创办了一家生产面粉机的工厂。

1934年,许麟庐从天津甲种商业学校毕业,然而,他对经商毫无兴趣,对书画情有独钟,整天徜徉于书肆画店。1939年,他与“旧王孙”、著名画家溥心畲结为忘年之交,经其悉心指导,书画及鉴定才华崭露头角。

1945年,许麟庐搬往北平,与山东老乡、齐白石的弟子李苦禅成为莫逆之交。这年12月,他在李苦禅的介绍下拜齐白石为师。81岁的齐白石原已声明不再收徒,这回却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。

1952年,许麟庐遵从父亲希望他从商的意见,接过北京大华面粉厂经理的重任。然而,许麟庐痴迷书画,兴趣始终在翰墨丹青上,由于经营不善,且缺乏热情,仅仅一年,面粉厂便宣告倒闭。李苦禅提议开设一家画店,许麟庐欣然接受,因为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内心的强烈愿望。不久,他拿着变卖三台磨面机所得的钱,在东南东北角西观音寺胡同西口,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专营现代名家作品的书画店——和平画店。

画店由徐悲鸿选址,面积不到40平方米,内外三块挂牌匾额分别出自齐白石、徐悲鸿和陈半丁之手。齐白石题写的匾额悬挂在画店的正门口,上面还有白石老人手绘的一只和平鸽,及题书的“和平”二字。

画家黄永玉回忆:“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,好客成性,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率而老到,展出的作品大都已经精选,售价也体察人意,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。”

和平画店开办之初,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,但艺术品市场较为冷清。当时,画店以销售齐白石、吴昌硕等名家作品为主,尤其齐白石的书画为多。为人瞩目的是,白石老人时常会到画店坐一坐,有时还在现场授徒、作画,吸引了书画爱好者纷至沓来。

名家云集,成为书画沙龙

许麟庐人缘好,朋友多,和平画店开业后,逐渐在文化界积聚了不小名气,成为京城各界名流的雅集场所。

当时,文学界、书画界、戏剧界的名流,甚至政府机关的要员,如郭沫若、老舍、张伯苓、梅兰芳、邓拓、曹禺、艾青等都是画店的常客,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叶浅予、李苦禅、启功、李可染、黄胄、黄永玉等书画家也频频光顾。外地的书画家到了北

京,也都慕名而至,包括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、“海上画坛”的陆俨少等,并将自己的画作挂在画店售卖。许麟庐因此得以结识来自大江南北的众多书画名家,同时亦结交了许多当时尚未成名,日后备受市场青睐的青年画家。

在熙来攘往的文人墨客中,举止大方、出手阔绰的莫过于戏剧家洪深。他第一次到和平画店时,看到店内挂的几乎都是齐白石的作品,大手一挥,全包圆了。那个时候,齐白石的一件普通画作,大概十多元人民币。因画店内的书画被一买而空,许麟庐只好去天津等地收购。洪深第二次再来,看到店内又挂出了许多齐白石的书画,于是“故伎重演”,再次包圆。这事后来广为流布,被书画界、收藏界传为美谈。

一次,和平画店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顾客,他四处反复地看,亦不买画,却又力劝许麟庐去上海,“我可以在上海支持你,在上海再搞个画店。”许麟庐听了不明所以,摇头说:“那人离开后,才有热心者告诉许麟庐,刚才那位顾客是上海市市长陈毅。”

豪爽慷慨,人称“柴大官人”

和平画店除了主打齐白石的书画作品外,另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主人许麟庐身上那股侠义之气。许麟庐洒脱仗义、淡泊名利,朋友们总是将他与《水浒传》中侠肝义胆的“小旋风柴进”联系起来,亲切地称他为“柴大官人”。

那个年代,画家的生活并不宽裕,作为同行,许麟庐深知他们的艰辛,所以只要作品是真迹,他常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予以收购,又低价卖给那些囊中羞涩的书画爱好者,实则是变相援助那些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书画家。“柴大官人”的美名因此迅速传扬开来。许麟庐曾刻过一方“取诸怀抱”的闲章,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他创办画店的初衷。

黄永玉回忆,自己有一次在和平画店同时看上了齐白石和李苦禅的一件作品,口袋里钱只够买一幅,犹豫再三,决定买李苦禅的那幅《灰鹤》。许麟庐见状,说道:“永玉,真属于你的!你买齐白石的那幅吧,苦禅那幅我送给你!”交易就这样皆大欢喜地完成了。

许麟庐开门做买卖,有时还将自己的画作送给喜欢的人。黄永玉对他“纵情作画,信手送人”的做法颇有看法,忍不住提醒:“老许呀,老许!那幅画你珍惜尊重,自己的画倒是困地困,真难以让人理解。”许麟庐一脸无所谓:“人这一辈子,开心就行!”

许麟庐古道热肠,南方很多画家每每来到北京,也总要光顾和平画店,赏画畅谈后,吃住都在许麟庐那里,诸如陆俨

少、傅抱石、宋文治、亚明、魏紫熙、黎雄才等,许麟庐及其画店给予了他们浓浓的温情和关怀。夫人王龄文回忆:“有时晚上10点钟还有人呢。吃了,住下,第二天走了,问他(许麟庐)来是谁,他都还不知道。”“凡此种种,人们都说和平画店给当时生活困难的画家找到了一条出路。”

在黄永玉眼里,许麟庐“是个万事不在乎的员外脾气”,“当年的那个家,像座善心的寺庙,时常有些飘零落魄的和尚来‘挂单’,避个风雨,求点慰藉。爱住多久就住多久,前脚刚走转身又回来的照样殷勤欢迎。”“黄永玉深情感叹,‘这个家一直到今天,到我的见识和情感的极限处,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。’”

画店余音,无偿捐赠藏品

1956年,全国推行公私合营政策,许麟庐听从漫画家华君武的建议,关闭了和平画店,将店内近200件齐白石、吴昌硕及其他画家的书画作品(现多为中国美术馆收藏,部分作品上钤有“麟庐收藏”印),连同所有家具,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家协会,因此得以在美协的美术服务部工作,被委任为副科长。第二年,许麟庐调到荣宝斋,担任王府井分店首任经理,直到1984年退休,一做就是27年。

许麟庐学养深厚,书画鉴定造诣精深。上世纪60年代,时任文化部部长夏衍每年拨出几十万元,许麟庐受命奔走大江南北,负责为故宫和荣宝斋鉴定、搜购散落民间的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书画遗珍。当年,经许麟庐之眼、手发现的殿堂级珍品不计其数,包括曹寅的《墨梅图》和赵孟頫的手卷,皆价值连城。相传,荣宝斋的古今书画藏品,约有一半是由许麟庐收进的,如苏轼的《潇湘竹石图》(后由邓拓捐赠给中国美术馆),郭沫若因此为他题写了“竹篱斋”,许麟庐晚年在京郊顺义建造住所,即以此三字作为自己斋室和匾额。

从创办和平画店到后来供职于荣宝斋,30多年间,许麟庐以坦荡为人、仗义为友的君子之风,赢得师长、朋友、学生的信任和爱戴。“美术界的人都和和平画店去买画,因为和平画店没有假画”,李可染之子、著名画家李小可对和平画店评价至高,“‘和平画店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场所,它的与众不同之处,就是聚集了一大批20世纪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的作品,画店为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开辟了见面的场所,这对于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许麟庐是中国现代书画艺术品市场承前启后的衔接者和推动者,可谓实至名归。

周惠斌